

学校高绩效教学与管理丛书

教学伦理与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

台湾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编



Kecheng Lingdao Yu Youxiao Jiaoxue

甘肃文化出版社

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

台湾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 / 台湾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8
(教学伦理与教师专业发展)
ISBN 7-80714-157-3

I. 课... II. 台... III.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中小学
IV. 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190 号

书 名: 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
作 者: 台湾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编
责任编辑: 温雅莉
出 版 者: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mm 1/16
字 数: 1250 千字
印 张: 96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14-157-3
定 价: 495.00 元(全六册 含电子光盘)

序

“课程领导”是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历程的一环,由于以往学校“课程”经常被简化为“学科”或“科目”,且其发展或设计亦被归属为“教育部”和学科专家的“专利”,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则严密“控制”或“监督”基层学校和教师的课程实施或教学。因此,对学校而言,当论及“课程领导”时,大多局限为教育行政机构或学校领导者“监控”或“督导”教师课程实施(或教学)与绩效评鉴等行政手段。

然而,当课程监控的枷锁松绑之后,学校课程的内涵从静态的学科或科目、目标与计划等扩展到动态的师生互动过程与经验,课程决定权则从教育行政、学术机构延伸到学校、教师和学生,“课程发展”便成为学校和教师的专业任务之一。校长若希望教师和社区家长能积极参与学校课程发展,发挥有效的教学和学习,就必须发挥“课程领导”的功能,调整学校的组织架构和任务,并重新分配课程决定的权力,让教师们能感受到:教师不只是教学者,更是课程的研究者、发展者、设计者、实施者和评鉴者。因此,国小校长不能划地自限在狭隘的“行政管理”与“教学领导”,而必须扩及“课程领导”,必须肩负起校内课程领导的重责大任,并协助教师解决所面临的课程与教学难题。

本校“师资培育中心”针对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的议题,在去年(2003)获“教育部”补助,举办“有效教学和课程领导”学术研讨会。会中邀请淡江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研究所欧用生教授和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王思峰教授做专题演讲。欧教授分析了当前的课程政策,并指出课程改革措施的迷思所在,为当前教改乱象提出改进之道;王教授则从工商企业管理的观点对教学实务加以探究与评析,为大会带来极不一样的思维。二者精辟的见解,为与会者带来很大的启发。本中心教师群更从各自的专业立场,对学校课程领导和有效教学发表研究成果,并获得与会者很大的回响。为补足实务的不足,特在编辑成书之际,邀请台北县东山国小丘惜玄校长和基隆市尚仁国小李健铭校长贡献论文共襄盛举,在此予以致谢。

全书共分为理论与实务两篇,各篇均包含课程领导与有效教学。本书

得以出版,首先感谢“教育部”的经费补助,以及本校校长黄荣鉴教授和教务长张清风教授的支持与重视;其次,要感谢本中心和教育研究所的教师伙伴们,将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并协力合作分担研讨会各项工作;第三,张小芬教授担任地方教育辅导工作,负责规划与执行研讨会以及会后出书事宜,最为辛苦;第四,本中心组员戴碧玉和杨金枝小姐、“教育学程学会”的同学们在会前、中、后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让研讨会得以顺利圆满,更是功不可没。最后,感谢高等教育出版公司慨允出版,编辑群的精心编排,让本书得以很快与读者见面。我忝为中心主任,蒙师长的指导和同仁的协助,才得以推出本书,谨在此致上个人的谢忱。

台湾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任 游家政 谨识

目 录

理 论 篇

第一章 课程政策与课程领导——以九年一贯课程政策为例 2

- 第一节 前言 2
- 第二节 九年一贯课程政策的争议 3
- 第三节 课程政策与课程领导 11
- 第四节 结语 15

第二章 国民小学校长课程领导的任务与策略 16

- 第一节 前言 16
- 第二节 学校课程革新与校长的领导角色 17
- 第三节 校长课程领导的核心任务 23
- 第四节 校长课程领导的有效策略 27
- 第五节 结语 33

第三章 有效教学来自于视域交融 ——“靠”与“看”作为生命教育的基本要素 35

- 第一节 前言 35
- 第二节 师生互动与视域交融 37
- 第三节 “视域”中的“靠”与“看” 43
- 第四节 从视域交融看生命教育教学的意义 48

第五节 结语 52

第四章 教学视导人员能力指标之探究 55

第一节 前言 55

第二节 计划准备层面 60

第三节 教学观察层面 66

第四节 回馈分析层面 68

第五节 专业成长层面 72

第六节 结语 76

第五章 e 世纪科学教师有效教学的基本要件 78

第一节 前言 78

第二节 学科知识 79

第三节 一般教学知识 83

第四节 学科教学知识 84

第五节 在职进修 86

第六节 结语 87

第六章 教学档案作为教师专业成长工具之问题探讨 68

第一节 前言 88

第二节 文献探讨 91

第三节 实际问题探讨 94

第四节 结语 100

实务篇

第七章 校长课程领导之实践历程——以东山國小为例 103

第一节 前言 103

第二节 迷你学园——坐落千群山之间 104

第三节 众里寻他——形构课程领导理念 105

第四节 蓦然回首——建构校长课程领导的运作架构 106

第五节 柳暗花明——落实校长课程领导之运作历程与实例 106

第六节 结语 113

附件一 台北县汐止市东山國小经营理念 113

附件二	台北县汐止市东山国民小学——学校愿景与教学目标	114
附件三	协同教学领导组织图	116
附件四	东山国小协同教学运作模式	117
附件五	东山协同教学运作流程	118
第八章	国小校长课程领导行为及其权力运用	119
第一节	前言	119
第二节	校长的课程领导行为	120
第三节	校长的权力运用	122
第四节	校长课程领导行为的落实	124
第五节	校长课程领导行为的权力运用	125
第六节	教师对校长课程领导行为权力运用的接受情形	128
第七节	建议	129
第八节	结语	132
第九章	实作评量在国小高年级英语教学评量上的应用	133
第一节	绪论	133
第二节	文献探讨	13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42
第四节	结果与讨论	151
第五节	结论与建议	158
第十章	声调分析软件在听障学生国语声调有效教学的应用	160
第一节	绪论	160
第二节	名词诠释	16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64
第四节	研究结果	170
第五节	讨论	172
第六节	结论与建议	172
第十一章	趋向于专业发展的集体性实践	
	——深美国小之校园文化与班群网络	175
第一节	专业与专业发展的集体与脉络本质	175
第二节	深美国小之班群网络发展报告	186

第三节 深美国小之组织文化报告 191

第四节 小结:返点后共同的待续 213

理 论 篇

■ 第一章 课程政策与课程领导

——以九年一贯课程政策为例

欧用生

□ 第一节 前 言

课程改革是复杂崎岖的过程,相关政策当然要随着实施状况适时修订,但如果政策朝令夕改,摇摆反复,将令人无所适从,丧失对政策的信心,增加课程领导上的困难。如 Fine 与 Weis(2003)所说的,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要创造学校中的光辉,但也要维持决策上的稳重,长久以来教育决策反反复复,而且决策和实践分离,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所有的政策都拟定了,却将好的教育实践排除在立法之外。这也是最近几年以来,台湾省教育政策、课程政策的写照,值得大家深思。

九年一贯课程政策也是反复无常,这种例子俯拾可见。首先,课程统整和协同教学是九年一贯课程的精华,1998年9月的暂行纲要规定:“学习领域之实施应以统整、合科教学为原则”,2000年9月暂行纲要改为“学习领域之实施应以统整、协同教学为原则”,都一直坚持统整课程和协同教学的精神。但是在中小学教师对教育改革不满之声日渐高亢,尤其在10万名教师走上街头抗议以后,课程纲要已改为:“学习领域之实施应掌握统整之精

神,并视学习内容之性质,实施协同教学。”也就是老师们要统整就统整,要协同就协同,原本应该是生命力丰富的九年一贯课程,至此精华尽失,形骸徒具!教学现场都解读:“教育部”已弃守九年一贯课程,悄悄地宣判了它的死刑。

又如,近几年来的教科书政策也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抨击之下,摇摆不定,甚至是一片混乱。在“立法委员”和业者的压力下,1985学年度起开放小学教科书,1991学年度随九年一贯课程的实施,开放中学教科书。但一开放就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在开放中丧失利益的、或没有获得利益的业者,又结合“立法委员”对审定本教科书大肆批判,在这些“批判的大合唱”声中,教科书政策被迫转向,主管部门又恢复编辑教科书。教科书政策是一项重要政策,攸关200多万年轻学子的学习,十几万教师的教学和公民的学力水准;它是一种公共政策,应该展开公共论辩,作更多的公共论述,但几位“立法委员”说改就改,说恢复“国编本”就恢复“国编本”,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教育专业不见了,教育领导中最重要的“专业的坚持”(Fullan, 2003)到哪里去了?

以上这两个例子不仅显示了课程改革的复杂样貌,也显示了课程政策的高度争议性。本文将以九年一贯课程为例,探讨课程政策的争议问题,并申述其在课程领导上的意义。

□第二节 九年一贯课程政策的争议

课程政策是高度复杂与充满争议的,和课程的意义一样多元化,正式文件上宣称的课程和教室中实际实施的课程不同,所以,探讨课程政策时,首先要区别政策是一种意图的宣称,即应该是怎样的宣称;或政策是一种行动,即实际上发生的事情(Elmore & Sykes, 1992)。从决策者或官僚的观点来看,政策是法律或规定中的宣称;但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观点来看,政策是在教室中实际传递的内容。课程学者将课程视为内容和学习结果间的预测,课程政策学者也将政策视为政府的行动及其结果的假设;公共政策认为,政府的干预只是决定政策权威中的一种,课程学者也认为课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正显示了课程政策的复杂性(Cornbleth, 2000; Elmore & Fuhrman, 1994; Elmore & Sykes, 1992; Pinar, 2004)。

九年一贯课程是台湾省课程史上改革幅度最大、影响层面最广的一次改革,当然也是争议最激烈的一次改革。由于制定过程仓促,参与层面不广,纲要草案又充满了新的课程语言,因此它一出生,就注定了乖舛的命运。学科专家和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因为课程统整失去了学科主体,展开强烈的抗拒;学者、专家、教师和家长为了争夺课程主导权,纷纷投入战场;民间团体和出版业者也不甘示弱,“立法委员”当然也要参一脚。人人都怕在改革中失去利益,或想从改革中获得一些利益,因此彼此“呛声”,相互较劲,形成了教育改革的战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再怎么配套也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任何政策都像走在钢索上,追求恐怖的平衡。新课程终于在“教育部”营造的气氛中,快乐“出航”了。

但是,课程实际是教师、学生和知识不断的交互作用及这些交互作用所在的脉络的结果,这些脉络包含周遭的教室、学校、社区及广泛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改变课程实际,如使它更融入、更具多元文化、更公道,不仅要计划理想的实际,更要改变支持的条件和脉络,这是在设计和脉络之间往返的回归(recursive)过程。忽视脉络的因素,就像将种子种在干燥的土地上,或种在肥沃的土地上却缺少水分,结果传统的课程、政策、计划和发展,无法改变教室的课程实际。脉络的政策、政治的层面,如专家或公共论述,对课程实际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时论述比所作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力,对该教什么、教谁及如何教等作继续的、广泛的对话或争论,比正式的国家政策更影响课程实际(Cornbleth, 2000)。

所以新课程实施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配套措施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课程政策模糊而且朝令夕改,产生了观望的心理和信心危机。1990年以后一系列教育改革累积的不安和恐慌,因九年一贯课程的触媒,一下就引爆开来,终子酿成10万名教师走上街头,表达心声;保守势力借机反扑,面有“教育改革万言书”的出现。1990年以后益渐活跃的开放改革的气氛和论述,顷刻之间转向,顿时乌云笼罩,不仅要复古、复辟,甚至营造了究责、揪出真凶及斩首示众的论述。

在多元民主的社会,众声喧哗,百花齐放,每一种论述都是合法的,都可以被讨论。但在当前的台湾省,“放话”多于“对话”,“呛声”多于“论辩”,缺少课程慎思的平台,以至于各种论述及其假定无法明确,一直在暗默中影响课程政策,增加课程决策和领导上的困难,实有加以厘清的必要。兹将新课程政策的争议分为下列五项,加以说明。

一、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如影随形,一直在影响英美或日本最近的教

育或课程改革(欧用生,2003b;Apple,2001,2003;Whitty,2002)。但这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各异,对课程改革的主张不同。新自由主义认为,“公”为万恶之首,所有的“私”都是好的,因此强力主张“小而美的政府”,强调教育松绑,将所有的教育事务尽可能的交给市场决定;而新保守主义则主张“强而有力的政府”,以维持市场的秩序,扩张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但在英美两国,借着国定课程和国家评量的课程政策,两者妥协了。国定课程可加强国家历史、文化、道德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满足了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国家评量则可将评量结果公布,并列成排行榜,供家长选择学校的参考,有利于教育市场化的进行,满足了新保守主义的期望。

日本1998年的课程改革政策中也可以看到两者妥协的痕迹。如佐藤学(1999)所说,新课程标准是强调国民国家和家长制共同伦理的保守主义,和强调自由选择、自己责任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流。这次学习指导要领新增设“综合学习”,强调创造学校特色,鼓舞竞争,是为家长选择和教育市场化做准备,满足新自由主义的期望;培养有创造力,具问题解决能力的“坚强”日本人,以重建“旭日再升”的日本“国”,则在满足新保守派的梦想。所以说综合学习是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体(欧用生,2003a)。

台湾省的教育和课程政策到底是走向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1996年教育改革咨议报告书大力强调“教育松绑”,要求解除对教育的控制和管制,已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子;此后师资培育多元化,教师会的设立,校长的甄选,教师及家长的校务参与,多元入学的实施等,都逐渐朝教育松绑的方向发展;及至九年一贯课程公布和实施,强调学校本位课程发展,一纲多本,课程报备制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课程政策。但是先不论“松绑”的本质为何,新自由主义之路并不顺畅,保守势力伺机反扑,学者、“立法委员”结合媒体,强力塑造反教育改革的论述,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教科书审定制实施不到一年,已因“教育部”恢复编辑教科书而夭折。

现在又有人主张恢复联考,多元入学制度岌岌可危,其他的开放政策正面临严厉的挑战,命运未卜。和英美、日本一样,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也争夺着课程政策的主导权,战况惨烈,以致当前台湾省社会思潮中弥漫着一股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对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有很大的影响,课程政策左右摇摆,甚至让人有朝令夕改的感觉,对课程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现代或后现代

九年一贯课程改革政策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或是摆荡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我认为这一波新课程改革是“科技主义的狼披着进步主义的羊的外

衣”，外表上好像是后现代主义，但本质上完全是现代性的（欧用生，2003b）。新课程政策大力强调去中心、差异、多元、自主、增能等后现代的语言，教学现场也卖力配合，激情演出，校长跳天鹅湖、跳钢管舞，老师穿“关主”的服装，彩衣娱“生”；春节近了，全校搓汤圆；母亲节到了，全校师生“护蛋”；有的学校在山上举行毕业典礼，我们的学校就到海边去。这几年我们玩了一场轰轰烈烈课程改革的后现代大戏！这就是 Featherstone（1991：13）所说的“没有深度的后现代文化”。

这种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鼓舞梦想、欲望和幻想，将它视为浪漫的真实性和情绪的实现，产生直接的身体兴奋、审美快感和情绪快乐，自娱娱人。它不仅只是心理学的操作逻辑，而且是由消费经验中获得情绪的、审美的满足。消费文化利用媒体和广告，使商品和符号结合起来成为“商品—符号”，媒体不断的复制符号、影像和仿冒，模糊了现实和想像之间的区别，符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模仿的再制，丧失了稳定的意义，现象的审美化使大家迷惑于毫无止境、标新立异的追逐，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嘉年华气氛中（Featherstone，1991）。

更有甚者，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腐蚀我们的思考，斫伤我们的创意，并没有鼓励差异和多元，反而贬低了不同的选择，加强了主流模式的权力，愈改革愈趋向一元。学校因追求能力指标和绩效责任商趋于单一，课程和教学因追求好成绩而趋向“标准”和“传统”。学校的课程改革去适应消费资本主义的主流论述，丝毫无力反抗。资本主义不仅不能脱离后现代文化，反而要利用后现代文化以促进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开始适应后现代主义的消费者口号，如拥有、反省、多元和选择等，以这些口号来包装效果、效率、绩效等现代性的鬼魅。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思维去拥抱后现代的大腿，表面上大喊自主、增能、拥有、多元等口号；表现上，泰勒主义（Taylorism）被除魅化了，然而事实上，科技主义的狼只是披着进步主义的羊的外衣，其实是被“市场化”了，却以新的形象出现，借尸还魂，主导课程改革（欧用生，2003a）。

三、卓越或正义

教育一向被视为厚植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因此各国无不全力追求教育的卓越，但卓越不能只是少数几个人，卓越的成果更不能只是少数人独占，要让全民分享，因此教育改革不能忽略社会正义。但教育政策如何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又能顾虑到社会正义？“行政院教育改革咨议报告书”中除了揭示卓越的理想外，更强调“带好每一个学生”，政府也实施了一些照顾弱势、平衡城乡差距和加强机会均等的教育措施，显然已考虑到社会正义。但是社会正义是整体结构的问题，不是枝枝节节的点缀就能解决的，

因此当前的课程政策能否兼顾社会正义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强调自我选择和自我责任,依据“适应主义的强者”的逻辑: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要好好比赛,不要为你的失败找借口!结果无法获胜的弱者被弃之如敝屣,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政策拟定者忘了,许多比赛是不公平的,由于种族、性别、阶级、机会和财富等因素,许多人在比赛前就处于劣势,甚至还没有开赛,有的就已经被淘汰了。而且如 Apple(2003)所说的,经济资本能转换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尤其是在结构松散的社会中,这种转换更为容易。台湾省近几年的课程改革强调松散和多元,重视学校本位与自主学习,提供了经济资本转换的更大空间,结果学习上的双峰现象益为明显,也更扩大了阶层之间的差距。

例如九年一贯课程实施以前的“课程”,无论是贫人或富人子弟,国语都有十节课,老师带着走,比较有机会照顾每一个人,即使是穷人的子弟也较有机会打好学习的基础。但新课程中,国语被大量削减,约只剩五节,剩余的节数用于加强英语或资讯。想想这种改革对谁比较有利?对穷人子弟而言,国语削减,学习的基础更差了,家里没有英语学习的环境也没有计算机,每周一两节的英语和资讯课,没有让他们获益;而富人子弟却有很好的条件学好英语和资讯,让他们掌握更多的优势。而且所谓快乐学习或学习多元化,如要儿童写读书心得、调查百货公司的产品、写访问报告等,农人子弟怎么办?有钱的子弟愈来愈好,没钱的子弟上不了电梯,提早就被筛选到别的渠道去了。

这些说法并不表示不要改革或回到一元化,而是要提醒课程政策的矛盾,课程松散、学校本位、教学多元化等都是双面刃,不能理所当然的加以接受;而且课程改革如果忽视社会正义,任由社会阶层的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公共教育要促进社会流动和机会均等,但是学校教育却一再制造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学校是一个公共领域,却大多在为私的利益服务,表面上宣示民主,实质上是权力的阶层化。因此未来的公共教育应该如何发展?这不仅是政策决定者、“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责任,它是严肃的、批判性参与的知识计划,需要教育者与学生、家长、社区人士和其他关心者共同合作,重新思考“学校是什么?今后的学校应该怎样”。所有年轻人要超越种族、阶级、性别、法律、语言和能力等限制,聚集在一起,探讨现在的世界,想像未来应该的世界,而公共教育是提供这种机会最好的场域。因此教师要重新想像学校(re-imagining school),回应呼唤你成为教育者的声音,创造更多的对话(extraordinary conversations),使过去被消音的能说话,权力的不平等能被质疑,建设性的异议声音能更响亮,领导者的工作是

创造教室中的光辉和决策上的稳重(Fine & Weis, 2003)。

课程知识不仅是学术和专业的问题,也涉及社会的利益和公道问题。课程的对立要加以质疑和论辩,课程争议或游戏场不能只由握有权力的个人和团体来决定,争议越公开,课程越能被探讨,公共利益也越能被确认。

四、市场或专业

九年一贯课程强调课程统整和教学创新,但是家长要求考试,考上一流的学校,校长和教师要怎么办?随着市场走?还是追求专业?尤其国中校长更面临两难的抉择。最近几年以来,在教育市场的强力压迫下,教育专业可说是节节败退,教育市场化的逻辑和思潮已渗透到课程政策之中。教育市场化强调,公的力量和民主的美德已经失败了,私有的市场才能有效地达成社会和经济的改善;因此主张将市场因素导进教育服务中,将原本属于公共政策的事项允许私领域的提供者介入,将公共服务私领域化,将教育服务私有化。教育权威松绑,教育系统向下授权,加强机构自主和学校本位的行政,加强家长选择和社区参与。新右派强调,这种市场化的政策,重视现场本位的专业和社区本位的咨询,将使服务多元化、学校专业化;使不利家庭受益,以响应家长和社区的需求。

最近台湾省的课程政策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充满了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不仅教育松绑、家长选择和社区参与等口号响彻云霄,许多开放措施已在教育现场实施。在家长和社区的频频叩关之下,封闭已久的学校“专业大门”被迫敞开;校长遴选、教师甄选、教科书选用和学校选择的结果,教育和学校成为一个大卖场,校长、教师、家长甚至儿童等都被商品化,摆上橱窗,被赋予标签和定价,彼此批评和选择;他们成为教育市场中的竞争者,彼此担负绩效责任。

教育市场化的政策不仅影响专业的坚持,并容易损害自由、民主和公民责任的价值。新自由主义强调全球市场的自由化,这种民主的概念是矛盾的(Smith, 2003),1980年代以后,新右派将教育导向于可买卖的商品和服务语言,政策的协商和实施几乎都没有经由公共论辩或获得普遍共识,对市场自由化而言,民主是一个问题,因为民主的过程阻碍了获得和维持商业利益所需作决定的速度。在自由市场的原则下,往往是手段决定目的,讯息受媒体严格控制,压制另类的知识,民主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这些都是现代民主危机的症状。

教育市场化政策对社会公领域的诋毁和私领域的神圣化,被批评是一种教育的危机(Apple, 2003; Kincheloe, 1999)。在新右派极力倡导“公为万恶之首,所有的私都是善的”的潮流下,学校培养民主和民主市民公共教育的